

# 论杂家话语方式的生成

## ——以《吕氏春秋》为中心的考察

宋文婕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市 100875)

**摘要:**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选择了直陈谏言、兼合百家、参之于古的话语方式,来完成其构建政治学术理论系统及进谏的编著目的,这些话语方式的选择与杂家话语内涵的谏议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均有直接的关系。杂家话语内涵主要由其“出于议官”的职事功能决定,它是话语方式选择的基础,具体到文本,文本编撰动机是影响话语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结合话语内涵与文本编撰动机,有利于从制度上探讨《吕氏春秋》话语方式的生成机制。对杂家话语方式生成的研究,有利于探析先秦学术向秦汉学术转折的机制,有利于探析汉代学术话语方式生成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杂家;话语方式;吕氏春秋;谏议;综合;学术体系

**中图分类号:**I207.62;B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4-0114-08

战国末期,中国思想文化在激烈的争鸣后逐渐步入知识总结的阶段,各种有综合性特点的著作预示着知识总结的趋向,如《荀子》《韩非子》等,这些著作在建立自己的知识理论系统时展现了对其他知识的包容,这种学术包容的恢弘气度在汉代成为学术的重要特点。杂家是在这一趋向向下诞生的唯一一个明确以综合性为主要特点的诸子学派,是在诞生时间上较其他各家更为接近秦汉学术的流派,同时也是先秦知识总结向汉代知识爆炸转折的关键节点。编著于秦统一六国前夕的《吕氏春秋》是现存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杂家代表作,以《吕氏春秋》为中心考察杂家话语方式的生成,不仅可以探索杂家的话语方式,也对先秦及汉代学术研究有借鉴意义。

现有研究往往将诸子话语方式与文体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关于诸子话语方式生成的研究以过常宝先生的著作《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及一系列相关论文最具代表性,过常宝先生考察了西周时期文献及春秋战国诸子话语方式的生成。现有杂家研究或从诸子学角度注目于杂家作品的具体分析及杂家整体状况的宏观描述,或从目录学角度注目于杂家的目录考辨及内涵演变进行考察,或置于比较视野将杂家与其他作品或思想进行对比研究,但现有杂家研究中尚未见到关于杂家话语方式生成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在杂家现有研究基础上进行尝试,在借鉴现有话语方式生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吕氏春秋》为中心考察杂家话语方式的生成。

### 一、杂家话语内涵

杂家话语方式是由话语内涵所决定的,话语方式的生成机制建立在话语内涵的生成之上。分析杂家话语内涵是探究杂家话语方式生成的前提。“杂家”一词最初见于《史记·韩长孺列传》:“御史大夫韩安国者,梁成安人也,后徙睢阳。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驹田生所。事梁孝王为中大夫。”<sup>[1]</sup>

收稿日期:2016-03-18

作者简介:宋文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11&·ZD103),项目负责人:过常宝。

一般认为此处的“杂家”并非杂家学派,而是一种杂学思想。杂家学派正式确立是在刘歆《七略》的“诸子略”中,《七略》已经亡佚,其主要内容在《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中较好地保存了下来:“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sup>[2]</sup>《汉志》对杂家的界定是从学术流派角度进行的:“夫部类之分合,随宜而定。书之多寡及性质既变,则部类亦随之而变。”<sup>[3]</sup>从目录学中诞生的杂家,一定会受到目录学规律的影响,《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及《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虽然对杂家重新进行了界定,但均在秦汉杂家较纯粹的诸子学派内涵范围内,只不过进一步掺杂了目录学的工具内涵,将杂家设定为目录学中能够包揽一些无法分类之书籍的目录学类目,如《隋志》将新出的类书及无类可归的佛道书籍如《皇览》《高僧传》等都收录到杂家目录之下。

本文探讨的杂家是作为诸子学派的杂家,主要从《汉志》出发探究杂家学派的话语内涵。话语方式与话语内涵直接相关,厘清杂家话语方式的生成,必须首先明晰杂家的话语内涵。杂家学派的话语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 (一) 谏议性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汉志》认为杂家出于“议官”,此说虽然受到质疑,然“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sup>[4]</sup>,且从“议官”中确实可窥见杂家学派的内涵特点。关于“议官”,主要有“谏官”和“议郎”两种解读,本文以为“议官”不是一个具体的职位名称,而是一个类别的总称,其职责范围包括与君主应对及规谏讽喻君主。“《汉志》著录杂家 20 家,虽然今天保存较为完好的仅有《吕氏春秋》、《淮南子》二书,但从这 20 家杂家作品中,能够初步考证出其中带有明显谏、议色彩的作品,仍有 12 部之多,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这 12 部作品是:孔甲《盘盂》26 篇、《伍子胥》8 篇、《子晚子》35 篇、《由余》3 篇、《尉繚》29 篇、《吕氏春秋》26 篇、《淮南内》21 篇、《淮南外》33 篇、《东方朔》20 篇、《荆轲论》5 篇、《博士臣贤对》1 篇、《臣说》3 篇。此外,其他部分作品也可以间接证明其可能具有谏议性。”<sup>[5]</sup>不仅如此,未收录进入《汉志》的东汉杂家作品,也都具有强烈的谏议性特点。随着杂家内涵的模糊化,杂家的目录工具性日益突出,杂家的谏议性才逐渐消解。

杂家学派确立之前未见有某家或某类文献的话语内涵之一是谏议,虽然此前“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思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sup>[6]</sup><sup>1609</sup>,杂家出现以后,“谏”才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谏议在两汉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两汉朝廷均发布了大量求谏诏令,“其规模和数量可谓前无古人,后乏来者”<sup>[7]</sup>。刘向《说苑》称:“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戇谏,五曰讽谏。”<sup>[8]</sup>班固《白虎通·谏诤》:“人怀五常,故有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sup>[9]</sup>只有谏在形式上足够丰富,才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谏的丰富性在文献上也才有体现,如辞赋的重要话语特征亦是具有谏议性,“赋能否做到谏谏,是赋家衡量一篇赋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sup>[10]</sup>。

### (二) 综合性

“兼儒、墨,合名、法”,《汉志》指出杂家的主要特点是兼合儒墨名法诸家。杂家兼收各家思想的特点毋庸多言,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与认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将杂家的综合性特点定义为杂家学派的唯一特点,如认为淳于髡及《管子》《鹖冠子》为杂家代表者的就大有人在,郭沫若甚至认为荀子“实在可以称为杂家的祖宗”<sup>[11]</sup>。这些论点均将杂家的综合性特点放置于战国后期学术综合趋向的潮流中来理解,本文以为单纯从这一角度界定杂家学派会导致杂家概念的模糊化。随着学术的交流与发展,杂家的综合性表现得愈来愈多样化。《隋志》对杂家的界定从“盖出于议官”转为“盖出史官之职”,这意味着“在‘杂’的大旗下,就不仅可以议论,也可以叙事了”<sup>[12]</sup>。杂家逐渐超越诸子而成为一个跨类的概念,体现在具体文献上,就是杂家的综合性内涵从初期表示各家思想的交融发展到后来表示文体类型的多样,如《隋志》就将类书和佛典归并到杂家类。《史通·叙事》以“诸子短书,杂家小说”<sup>[13]</sup>并称,将杂家和小说家在子部中进行合并。《四库全书总目》将笔记、丛钞等归入杂家,使杂家成了“杂之义广,无所不包”<sup>[14]</sup>的文体综合分类。

综合性被认定为杂家的根本特点,不像谏议性那样随着学术发展而从主要属于杂家的特性转

移为汉代多种文体的特性并在杂家内部逐渐消解。《汉志》之后，杂家的综合性依然存在，并在不同角度得到展现。值得注意的是，综合性也是整个汉代学术的一大特点。不少学者认为，现存第一部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开了综合改造前代学术成果的先河，整个秦汉学术总体上均呈现出这种综合性特点。

### （三）系统性

“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杂家熟悉现有国家体制，关注国家治理问题，具有政治建设的特点。虽然这也是各家诸子的共同特点，“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sup>[15]1746</sup>，但杂家与其他诸子不同的是，它往往能从宏观层面来系统地关照国家治理，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都试图为统治者提供一套完整的统治秩序。东汉以来，杂家的这一特点发展为对社会政治各层面的广泛关照，政治关照的广泛性逐渐取代系统性。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应劭《风俗通义》等均对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有所关注，力图规范现有政治建设秩序。

对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不仅是杂家的特点，也是汉代学术的整体特点。同样，政治建设的系统性特点也是汉代学术的整体特点，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成熟的论述。周桂钿、李祥俊指出自杂家现存第一部代表作《吕氏春秋》编成后，“流派间的冲突斗争将为学术体系的建构所取代”<sup>[16]14</sup>，“《吕氏春秋·十二纪》所阐发的大一统的宇宙系统论，更成为秦汉以至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信条”<sup>[16]26</sup>，对政治体系、学术体系的自觉建设成为秦汉学人的自觉追求。回到杂家本身来看，与杂家谏议性的渐趋消极一样，后期杂家并不表现为对政治建设的高度关注，如《四库全书总目》将杂家类分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类，只有杂学中收录的部分早期杂家作品以关注政治建设为特点。

### （四）辩证性

《汉志》称杂家之弊在于“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并非所有杂家均具有突出的谏议性、综合性及系统性，当“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之人致力于杂家时，“是以杂错漫羨，而无所指归”<sup>[17]</sup>，就会造作出距离本道甚远且杂错的杂家作品或思想。杂家话语内涵具有辩证性的特点，其实，不仅杂家存在这种情况，《汉志》“诸子略”中的其他诸子亦是如此：儒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sup>[15]1728</sup>；道家“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sup>[15]1732</sup>；阴阳家“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sup>[15]1734-1735</sup>；法家“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sup>[15]1736</sup>；名家“及警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sup>[15]1737</sup>；墨家“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sup>[15]1738</sup>；纵横家“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sup>[15]1740</sup>；农家“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sup>[15]1743</sup>。此外，六艺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均有此类现象，可以说《汉志》所载汉代学术普遍具有双重特性，完全纯粹的传统思想学术几乎是不存在的。班固在《汉志》中客观地说明这种现象，并未对此过多褒贬，特别是在说明九流诸子中的“惑者”“辟者”“放者”“拘者”“刻者”“警者”“蔽者”“邪人”“荡者”“鄙者”投身于不同学派时，会呈现出不同于该学派最初话语内涵的状态，即使背离学派原有目的而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但其依然属于该学派的思想。

汉代学者班固自然不同于春秋时代孔子选择诛杀“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sup>[18]</sup>的少正卯，也不同于《荀子》《尹文子》《新语》及《史记·孔子世家》等所载孔子“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sup>[19]</sup>，班固冷静的学术态度源于对汉代社会发展的清醒认识。自会盟制度将人与神同时确认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后，社会就开始探索处理人神矛盾的健全机制。在此之前中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原始宗教信仰时期，“神”进行社会治理的经验十分丰富，“人”能够用业已完善的相关制度顺利地处理神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但处理人神矛盾及人性所带来的问题，相关经验并不充足。尝试协调人神关系、解决人性所带来的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的努力方向。然而，孔子采取搁置“神”而提倡“仁”来限制人性，终未阻止中国步入更动乱的战国时期。秦朝的快速灭亡更说明采取极端方式压制人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善于反思的汉朝人选择正视人的问题。

《汉志》对杂家及其他学派话语辩证内涵的描述,反映了对社会总体矛盾的清醒认识。这一认识从人与神一同成为社会管理主体时就开始发展了,从文本来看,《吕氏春秋》在建立学术体系及政治体系时,即已充分考虑了如何解决人神矛盾的问题。

谏议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是杂家话语的四大内涵,这四种内涵相互关联与依存而形成整体,使得杂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而得到认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阶段及总体矛盾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杂家话语的辩证性得以确认。为了建立一套解决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发展的政治学术机制,杂家话语必须具有系统性。系统性往往是已有各类资源整合后的成果,综合性在整合中得以体现。达到谏议目的之有效方式,即是采百家言论并撮其要旨来进言献策,杂家话语内涵的谏议性与综合性由此联系起来。谏议性是杂家话语内涵最为突出的特点,基本上是由“议官”的职能所决定的。包括杂家兼合各家思想的综合性内涵,不仅是对战国后期学术综合潮流的顺应,也是“议官”进谏职能衍生的产物,这一点在下文以《吕氏春秋》为中心考察时将有所说明。而杂家话语内涵的系统性、辩证性可视为“议官”对社会发展总体把握条件下的合理进言规范,系统性与辩证性同时难以与“议官”的职能脱离联系。对杂家话语内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以往人们常将杂家话语方式与话语内涵混合起来谈论,难以分清二者的差别。如果将杂家进谏的话语与杂家谏议性的内涵、杂家综合百家思想的话语与杂家综合性的内涵等同起来分析,这就不利于探究杂家话语方式的生成。杂家话语方式是由话语内涵所决定的,话语方式的生成机制建立在话语内涵的生成之上。分析杂家话语内涵是探究杂家话语方式生成的前提,以杂家话语内涵为线索是分析杂家话语方式的有效方法。分析杂家的话语方式还必须落实到文献中去,《吕氏春秋》作为现存第一部杂家代表作,也是最重要最典型的杂家代表作,其话语方式能够较好地代表杂家学派的话语方式。

## 二、《吕氏春秋》话语方式的生成

杂家话语方式的生成与杂家话语内涵有直接的联系,但在具体文本上,不同文本的话语方式选择则与其文本性质直接相关。大多数学者关注《吕氏春秋》(以下简称“吕书”)文本最终呈现的效果,如毕宝魁认为“吕不韦编撰此书的动机确实是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新政权所作的文化准备,是建国治国的大纲”<sup>[20]</sup>。很多学者也因同样的原因将吕书定义为一部系统的政治理论书籍。本文以为,据《吕氏春秋·序意》篇中吕不韦自述的创作目的:“尝得学黄帝之所以海颡頞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sup>[6]654</sup>秦王嬴政虽尊称吕不韦为仲父,然而吕不韦的身份决定了教诲实际上是进谏,从这一角度可将吕书定义为一部谏书。再结合《吕氏春秋·序意》所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sup>[6]654</sup>,可知吕书是一部通过建立系统治国理论来进行进谏的书籍,进谏与建立系统治国理论是吕书并行不悖的双重目的,而这两个目的均符合《汉志》所揭示的杂家话语内涵的谏议性与系统性特点。“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sup>[21]</sup>根据杂家话语内涵及吕书的编纂目的,可更清晰地探究吕书的话语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话语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类。

### (一)直陈谏言

有学者对《吕氏春秋》中的进谏进行了详细统计,总结出吕书中“关于如何当好国君而提供具体实施意见、理论根据和经验教训的是112篇,占总数的70%;关于人生经验的是23篇,占14.4%”<sup>[20]</sup>。在吕书之前的进谏,突出的如《左传》《国语》中的大量进谏,谏辞往往表现出怨而不怒的特征,当时更多的人在进谏时选择委婉曲折的方式,与吕书大致同一时期的著名谏书《谏逐客书》的话语方式,即是“避重就轻,减少对立;以美为刺,照顾颜面;顺情入机,谋求共识”<sup>[22]</sup>。因为吕不韦的身份,吕书的进谏常常选择直陈谏言的话语方式,甚至不畏冒犯秦王而表现得言辞激烈。

《吕氏春秋·尊师》开篇举出神农、黄帝、帝颡頞、帝喾、帝尧、帝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句践等16人尊师的例子后,直言“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

圣,而欲无尊师,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绝,三代之所以灭”<sup>[6]207</sup>,批评秦王嬴政没有圣贤帝王的尊贵与智慧却欲不尊师,质问秦王这样怎么可能成为他们那样的帝王。质问之后接着说秦王这样的状态正是五帝后继无人、三代消亡的原因。这样的话语方式不像是进谏更像是批评教导。《吕氏春秋·贵公》在说明“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后,通过伯禽与管仲的例子说明贵公有利于国家,通过齐桓公徇私情“用竖刀而虫出于户”的悲惨下场,按照一般臣子进谏的言辞逻辑,下文会再次重申贵公的主题,然而吕书却接着说“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饰服,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舜弗能为”<sup>[6]45-46</sup>。这分明是一顿劈头盖脸的丝毫不留情面的责备训导。如果说《尊师》篇中直指秦王不尊贵不智慧还与“尊师”的主题有关的话,批评其“愚”“日醉”“私利”“贪戾”等缺点则与贵公的主题并无直接联系。类似激烈的直言批评在《十二纪》中颇多。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逝世,嬴政登上王位,当时嬴政才13岁。“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sup>[23]223</sup>,“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sup>[24]2509</sup>,此时吕不韦权力大、责任重,他不但要消灭六国,还要对嬴政进行训导。《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sup>[23]230</sup>这些品格在嬴政少时应已有所显露,由此可见吕不韦选择直陈谏言甚至直言批评的话语方式,是有据可依的。

吕书直陈谏言的话语方式在《十二纪》中尤为突出,以陈奇猷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为:“《十二纪》确系成于秦八年即始皇六年,而《八览》、《六论》则成于迁蜀之后。”<sup>[25]</sup>《八览》《六论》是吕不韦受到秦王打压后创作的,在话语方式上必然有选择性地进行了调整。因吕书编纂环境的变化等原因,吕书整体呈现出前精后粗的特点。《十二纪》为吕书中最优秀的部分,在后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这和吕书直陈谏言的话语方式无疑是相关的。

东汉时期社会混乱,此时的杂家表现得十分急切,其结果就是话语方式的锋芒毕露和激烈张扬。被《隋志》收录为杂家作品的有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韩愈《后汉三贤赞》将三人合称为“后汉三贤”,称其“傲倪敢言”。严可均评《昌言》“闾陈善道,指诘时弊,剴切之忧,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磨灭者”<sup>[26]</sup>。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作为杂家代表作,选择“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激烈谏诤的话语方式,正是对《吕氏春秋》的回应和继承,这种话语方式在其他诸子中是少见甚至未见的。

## (二)兼合百家

吕不韦招致宾客三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sup>[27]</sup>,这种众多宾客集论的话语方式是兼合百家的。学界关于吕书学派归属的广泛讨论,侧面印证了兼合各家的话语方式。也有学者申明吕书是独立于各家而自成一家的著作,为吕书兼合各家话语方式的解读提供了新的思路。周桂钿、李祥俊指出“《吕氏春秋》开了综合改造前代学术成果建立为现实服务的新官学的先河”<sup>[16]25</sup>,认为吕书是一套新官学系统,其兼合各家的话语方式是改造前代学术而塑造新官学的产物。之所以称其为新官学,是因为吕书的编撰不仅顺应了战国后期学术综合的潮流,同时也具有旧官学的特点。

成为官学的必要条件是背后有相关的制度支撑。而就吕书来看,现存相关记载并未明确说明,对吕不韦组织编书的行为广受认同的解释载于《史记·吕不韦列传》:“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sup>[24]2510</sup>从表面文字来看,吕不韦是出于好胜的攀比心而花费巨大精力编就吕书。然而,当时作为相国的吕不韦在扶持年幼秦王的压力之下会不会为了一己的攀比心而这样做?这是值得怀疑的。同时,攀比说也将战国四公子的养士行为进行了过于简化的解读,不利于探究历史的真相。吕不韦编就《十二纪》后,在差点遭秦始皇诛杀的情况下,仍接着完成《八览》《六论》,这也不是简单的攀比心可以解释的。

本文认为吕书以进谏为目的,召集各方宾客集论而成,其成书方式继承了采诗制度。这是在制度支撑下进行的政治学术行为,也是它拥有成为官学的资格的前提。“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sup>[15]1708</sup>“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墉户而知天下。’”<sup>[28]</sup>先秦的采诗最终是为向王者进献谏言,“采风制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补察其政’,因而也就可说是谏议制度的上游环节,从而形成了‘诗谏’的特殊功能和意义”<sup>[29]</sup>。吕不韦组织门客收集各地各类见闻的行为及其目的,与采诗有相通之处。从采诗到形成最终文本,中间还要经历对诗的编辑整理程序,“所献之诗和所采之诗最后都汇集到王室乐官之手,他们来汰选、加工和编辑”<sup>[30]</sup>。吕不韦使门客著其所闻然后编辑整理出最终进谏的《吕氏春秋》,这一系列行动与采诗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本文以为,吕不韦组织众多门客广集各种思想来进谏的行为是对采诗进谏制度的继承,吕书兼合百家的话语方式不仅是战国后期学术综合潮流的产物,也是以谏议为目的的话语方式选择。

关于《吕氏春秋》话语方式的综合性,前贤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其中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新校释》最具有代表性。陈奇猷对吕书各篇的题目均进行了注释,并说明该篇的学派归属,认为吕书各篇分别属于以下学派及其支派:司马法之学,儒家,北宫黝、孟施舍、漆雕氏学派(儒家),道家,伊尹学派(道家),阴阳家,乐家(阴阳家治乐者),法家,料子、宋铎、尹文流派(名家),尹文学派(名家),惠施流派(名家),墨家,农家,子华子学派,季子学派,兵家,形法家等。对各家学派话语的吸收,正是吕书所表现出来的兼合百家的话语方式。吕书之外的其他杂家代表作往往亦有此特点,正如《史通·自叙》所说:“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sup>[13]291</sup>

### (三)参之于古

先秦秦汉学术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具有历史意识。《汉书·董仲舒传》谓:“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sup>[31]</sup>吕不韦继承了先秦学术传统,“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sup>[32]</sup>。吕书在构建政治体系时注重对古圣贤及早期稳定社会的推崇,这也是春秋战国各学派大多持有的立场。《吕氏春秋》在话语方式选择上自然体现了对此立场的坚持及对传统学术方法的继承,主要表现即是文本多采用参之于古的话语方式来建立理论框架。吕书参之于古的话语方式主要表现为古今对比和罗列历史寓言。

首先是古今对比的话语方式。吕书之前的文献,从论证方式上来看,《国语》《左传》的谏言大都采用古今对比论证或正反对比论证的表达形式,这也可以说是谏臣们的一个基本论证模式,即“昔……,今……”。在古今对比论证中,谏臣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往往先是引述或列举先王的言行事迹或至理名言,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的论证基石。因为《吕氏春秋》是一部以进谏为目的的政治理论书籍,在进谏方式上沿袭传统表达是必然的。从统计数据上可窥见吕书中对比话语方式的频繁使用,一般而言,“古”“昔”“今”等预示着古今对比的展开,吕书中“古”出现75次,“昔”出现36次,“今”出现277次,说明存在着大量的古今对比。在具体篇目上,如《吕氏春秋·异宝》篇通过古今对比的话语方式表达主旨,开篇说明“古之人非无宝也,其所宝者异也”,接着举孙叔敖子、江上丈人、子罕等的例子说明这些古人不重眼前的现实财物而推崇更高的精神价值。然后用现今的情况进行对比,“今以百金与抔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抔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最终在对比中说明古人“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今人“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sup>[6]558-559</sup>。对异宝的倡导在古今对比中来完成。《吕氏春秋》中像《异宝》那样采取古今对比的话语方式来说明主旨的篇目还有很多。如《异用》开篇也展开了古今对比:“古之人贵能射也,以长幼养老也。今之人贵能射也,以攻战侵夺也。”<sup>[6]568</sup>同样选择了古今对比话语方式的还有《节丧》《务本》《先己》等诸多篇目。

其次是罗列历史寓言的话语方式。过常宝先生指出,包括《吕书春秋》在内的寓言,“并不是一种凭空兴起的新的文体,而是在前代‘征引’和‘立象尽意’两种经典话语方式上发展而来的”<sup>[33]</sup>。对“征引”等经典话语方式的继承,能够很好地解释吕书罗列历史寓言话语方式的生成原理。吕书

选择参之于古的话语方式,除了源于对传统方法的继承,也与其文本性质等有关。前文已说明吕书的成书是为了构建一套系统的政治理论,系统的理论要建立在对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矛盾的清晰认识之上。在秦始皇建立专制统治之前,社会的矛盾虽从神的矛盾转化为人与天的矛盾,但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吕氏春秋》构建政治理论时必须考虑与过往社会矛盾有连续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必须带着历史思考来进行理论建构。《吕氏春秋·长见》开篇即表达了类似观点:“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sup>[6]611</sup>选择从古今对比角度来探索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无疑是有效的选择。不仅吕书如此,《淮南子》也以“为封建统一大帝国的长远统治,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学说”<sup>[34]</sup>为目的,故“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sup>[35]</sup>。

现存杂家第一部代表作《吕氏春秋》选择了直陈谏言、兼合百家、参之于古的话语方式,以完成其构建系统政治理论及进谏的编著目的,这些话语方式的选择与杂家话语内涵的谏议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均有直接关系。其中吕书直陈谏言、兼合百家的话语方式与杂家谏议性、综合性的话语内涵密不可分。参之于古的话语方式则主要与系统性、辩证性的话语内涵相联系,杂家的系统性与辩证性均来源于社会转折时期对社会发展的整体局势的把握与谏议,参之于古是为建立适合新时期社会形势的政治理论的通行法则。由此看来,由“出于议官”而生发出的杂家话语内涵是杂家话语方式选择的基础,文本编撰动机则是影响话语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结合话语内涵与文本编撰动机,从制度上去探讨《吕氏春秋》话语方式的生成背景,是分析其话语方式生成的有效方法。

### 三、余 论

过常宝先生认为先秦时代不同的话语方式并不是作家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吸收宗教、职业、经典等话语资源后探寻出来的不同的理性论说模式<sup>[36]</sup>。通过分析杂家话语内涵,可以明确认识到杂家所吸收的话语资源是来自于议官话语与其他诸子的话语,是为了建立一套解决天人矛盾的有效政治理论而探索出来的论说模式。“诸子出于王官说”是对诸子话语方式生成的最早系统解释,因其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时的历史时代而有更高的可信度。同时,“王官说”也是刘向、刘歆父子长期学术研究的成果,经过后人不断的质疑与验证,“王官说”的合理性得到愈来愈多的认可。即使脱离“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的先决条件,分析杂家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均能反向说明“议官”的特点。

以“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为切入点,可以进一步发现杂家的谏议性与综合性等在汉代文学文化中得到广泛的发扬,不仅是因为杂家作品本身的优秀品质,更是源于其背后支撑的制度构成。杂家出于议官,与议官概念最为接近的汉代职官是郎官,郎官是汉代数量庞大的中层官职,“在武帝以内御外的政治格局中,不仅参与机枢,议决朝政,更承担起构建帝国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任务”<sup>[37]</sup>。《汉书·古今人表》著录了上至伏羲下至陈胜、吴广等人物近两千人,将其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上至下下九品。虽未收录汉朝人,但其分类标准体现了汉代学术的特色,除了孔子、左丘明等少数几位儒家代表人物列为上等之外,大多数诸子学派人物均列为中等,同样列为中等的还有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的代表人物。简言之,《古今人表》的中层人物涵盖了《汉志》除六艺略少部分代表人物之外的所有学术体系,包括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公羊学代表人物公羊子亦在中层。就像汉代学术主要由处于中层官职阶层的议官来承担构建任务一样,《古今人表》将汉代学术创造情况反映到其分类标准上。如果说是处于《古今人表》中层的吕不韦组织编纂的《吕氏春秋》对汉代学术起到了深刻影响,毋宁说是汉代学术的主要创造者同吕不韦一样处于同样的中层话语系统,在相似的话语背景下创造的话语方式必然呈现出相互影响及相通的表象。学界将俳优与乐府、赋家联系起来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赋家与小说家、杂家进行的对比研究很多,这主要即是由于它们出于同一个官职阶层,即“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杂家学派的概念是在汉代学术著作中首次得到确定的,在诸子百家中,它是诞生时间更为接近



秦汉学术系统的一家。“议官说”在杂家与汉代学术之间建立了联系,为先秦学术向秦汉学术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解读思路。同时,杂家的主要特点是兼合百家,杂家所代表的话语方式是春秋战国知识争鸣的话语方式向汉代知识爆炸的话语方式过渡的一种具有节点意义的话语方式,作为一个不同于先秦其他诸子话语体系,杂家的转变为汉代话语方式的生成埋下了伏笔。本文在考察杂家话语方式生成的基础上,试图探析杂家话语方式影响秦汉话语方式的内在机制,为秦汉话语方式的生成研究提供一个铺垫。

####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M]//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1963:2857.
- [2] 班固. 艺文志第十[M]//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5:1742.
- [3]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M]. 成都:巴蜀书社,1991:142.
- [4] 胡适.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G]//耿云志. 胡适论争集:上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39.
- [5] 宋文婕. 杂家内涵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12:57.
- [6] 陈奇猷. 吕氏春秋新校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7] 王谨. 两汉的朝廷求谏与民间进言[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71-74.
- [8] 向宗鲁. 说苑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7:206.
- [9] 陈立. 白虎通疏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94:235.
- [10] 刘洪仁.“主文而谏”的典范——论宋玉的《对楚王问》《风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231-233.
- [11] 郭沫若. 十批判书[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3.
- [12] 韩云波. 历史叙事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J]. 社会科学研究,2002(1):140-145.
- [13] 浦起龙. 史通通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78.
- [14] 永瑛,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006.
- [15] 班固. 艺文志第十[M]//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6] 周桂钿,李祥俊. 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7] 魏徽,等. 志第三十 经籍三[M]//隋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3:1010.
- [18] 陈士珂. 孔子家语疏证[M]. 上海:上海书店,1987:7.
- [19] 司马迁. 孔子世家第十七[M]//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1963:1917.
- [20] 毕宝魁.《吕氏春秋》编撰动机论[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6):30-32.
- [21] 郭英德. 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9.
- [22] 冒志祥,侯吉永. 谈古代进谏公文的说服修辞[J]. 修辞学习,2007(6):76-78.
- [23] 司马迁. 秦始皇本纪第六[M]//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4] 司马迁.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M]//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5] 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M]//吕氏春秋新校释.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 [26] 严可均. 仲长统昌言上按语[G]//全后汉文:卷八十八.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88.
- [27] 司马迁.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M]//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1963:2510.
- [28] 班固. 食货志第四上[M]//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84:1123.
- [29] 夏保国. 周代采风制度与“诗谏”[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50-53.
- [30] 张克锋. 上古谏诤传统,献诗、采诗制度与诗歌讽谏论[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43-47.
- [31] 班固.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M]//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84:2515.
- [32] 司马迁.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M]//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1963:510.
- [33] 过常宝. 先秦寓言源流及其修辞功能[J]. 中国文学研究,2007(3):28-32.
- [34]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1987:156.
- [35]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454-1463.
- [36] 过常宝. 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
- [37] 成祖明. 郎官制度与汉代儒学[J]. 史学集刊,2009(3):34-40.

责任编辑 韩云波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